丁　辉

（1896—1933）

丁辉,别名月八，1896 年 8 月 15 日生于湖南省攸县高枧乡塞麦冲。祖父和父亲都以佃耕为生，他从小就跟大人到田间劳作。稍长，又去醴陵跟刘师傅学打猎和一些拳脚功夫。他为人豪爽正直,好打抱不平,很受乡亲们的推崇。

1928 年 4 月,丁辉与由醴陵转移攸县,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刘师傅久别重逢,同来的还有共产党员谢云、张克球、邓思球等人。他们一行的主要任务,是来攸县的高视、山关、排山等地开展地下活动，组建党的基层组织。丁辉在刘师傅的帮助指导下,以游乡工匠的身份奔走四方,做交通联络工作。

这年 12 月,经刘师傅和邓思球的介绍,丁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被派往高枧一带组织秘密农民协会。不料走漏了风声，大土豪丁占恒请来县保安团，采取突然袭击，一些会员惨遭杀害。丁辉被迫出走漕泊,参加了县赤卫队,与反动势力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不久，红十二军攻占攸县县城,他当选为县工农革命委员会粮食委员。

1931 年春，丁辉与谭国球奉攸县苏维埃政府派遣，分别回到高枧、排山,在攸(县)醴(陵)萍(乡)边界海拔 1000 多米的广寒坪筹建六区苏维埃政府。在他努力工作下，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组建了一支有 50 余人的区游击队。接着，他趁热打铁,引导县独立团、一区游击队和醴陵纵队,打垮驻扎在广寒坪山下的攸县保安团一个中队，攸县第六区苏维埃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府的红旗迎风飘扬在广寒坪的上空，令人为之一振。同时充实武装力量,将六区游击队组成新六连,他担任区苏维埃主席兼连长，谭国球任区委书记兼政委。

广寒坪根据地的建立,将攸县南北两片苏区连接起来,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要害处，因而招致国民党当局接连发起的“围剿”。

1931年6月29日，醴陵保安团驻船湾中队长贺石生率部百余人枪进犯，有的同志提出依托广寒坪的天险阻击敌人。丁辉说服大家，组成一支精干的突击队，立即奔袭敌巢船湾，迫使贺石生后退,然后相机歼敌。果然不出丁辉所料,这一战不但摧毁敌人船湾据点，而且在伏击战中，还缴获长短枪12支,打得保安团落花流水。9月，在县独立团的有力支援下，丁辉又先后击退攸县保安团长罗勋南和萍乡保安团贺枚生部的“进剿”,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为解决根据地被“围剿”和“封锁”的经济困难,丁辉经常带领游击小组,活动于碉堡林立的白区,采购物资,筹集款项。他在高枧一带先后活捉丁月芬、谭树四、康寿松、胡东八等19个大土豪,筹得数万银元巨款,送往湘赣省委。当年的县苏维埃主席陈向民后来回忆说：“六区丁辉和谭国球,每天都派人往县政府送钱或物资,平均每一天有一千多块大洋,成为湘赣省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1931年11月,广寒坪被十倍于已之敌攻陷,六区苏维埃政府与游击队移驻凤塔。此时，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状况愈发紧张，县苏维埃政府批准组成攸县第一支挺进敌后的游击队伍,由丁辉任队长,任务是除筹集经费、输送粮盐外,还兼铲奸除霸和侦察敌情。

丁辉长得身材高大,面色黝黑,豪绅们把他叫作‘雷公”。“你走路都要碰上‘雷公’”,一时竟成了豪绅们互相咒骂的口头语。可见,这位区苏维埃主席、游击队连长已经让土豪劣绅闻之丧胆了。

两个极端仇视工农革命的土豪,联合出钱购枪,组织护院家丁,暗中资助攻打游击队的敌军。丁辉得知后,一不做,二不休,组织爆破队,先将大部分碉堡炸毁,又查清和消灭敌人的潜伏哨,再收缴两家土豪护院家丁的枪支,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

1932 年 6 月,攸县苏维埃所有武装和醴陵纵队,加上独立师一个营共 500多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捉土豪筹款行动。丁辉带领大部队向北乡高枧和湖南坳一带进发,兵分三路,一路直捣高枧唐家山国民党军官亲属丁贤八的家;一路直奔白日坳捉拿土豪王恒乐等;丁辉带领县游击队的一个连担任沿途侦察和接应。在唐家山和白日坳两处得手后,独立师某营和醴陵纵队很快奉命返回苏区,丁辉斗志旺盛,他没有停止行动,而是继续率领县游击队和挺进队于傍晚突然包围了文昌碉堡,缴获一批枪支和钱物,将筹得的万余银元全数上缴给湘赣省委。三天后,湘赣省委在凤塔召开的千人庆功大会,特地给丁辉的挺进队颁发了锦旗。

同年 12 月,丁辉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活跃在攸澧、攸茶边界地区,搅得国民党湖南当局坐卧不宁,就连当时的湖南《国民日报》和《全民日报》都不断报道有关他的消息,惊呼 赤焰熏天”,还刊载通缉令,悬赏缉拿丁辉。可见当时丁辉率领的游击队给敌人造成的威胁之大。

1933 年夏初,丁辉在护送钱粮去湘赣省委的途中,在江

西莲花县蕉头冲遭敌突然袭击，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

（湘烈办）

于 洪 仁

（1908—1934）

于洪仁，1908 年生于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北岗子一个满族农民家庭。童年在本村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到宁安小学、宁安中学读书。

在中学读书期间，于洪仁受进步教师的影响，很快接受了新思想和革命理论。他积极参加校内反封建、闹学潮的斗争，和进步同学一起反对校长王子仁贪污、盗窃和欺压学生的行为。通过地下党团组织的培养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革命觉悟很快提高，于 1930 年初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下半年，于洪仁高中毕业。宁安县党组织派他到宁安腰岭子屯，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假期里，他组织一些进步青年秘密散发传单，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于洪仁目睹祖国山河遭践踏，人民受蹂躏的凄惨景象，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十分渴望到斗争第一线去，为拯救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抗日烽火燃遍宁安大地，各种自发的抗日队伍蜂涌而起。宁安县党组织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的抗日队伍，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先后派了许多党员干部深入各队伍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根据宁安县委的决定，于洪仁进入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军开展工作。

1931年冬，农民李荆璞在沙兰镇建立起一支农民抗日武装。1932年初又率队伍加入了救国军。不久，李荆璞看清了救国军的上层领导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决定把队伍拉出去，独自抗日。

1932年秋天的一天傍晚，李荆璞集合队伍，跟大家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打日本不能依靠救国军，半年多了，他们没有打过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应该自己干,保卫家乡。”

他话音刚落，于洪仁就从队伍中走出来，激动地对大家说：“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打日本就得靠我们自己带领老百姓干。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走，打日本需要枪啊，应该多弄些枪支。”

当天，李荆璞采纳了于洪仁的意见，自己假借向营长汇报紧急情况，带人到营部收缴武器；让于洪仁带领一个排在外巡逻，作应变的准备。他们神不知，鬼不觉，一枪未发收缴了营部的所有武器。

第二天，李荆璞又找于洪仁为其献计。于洪仁详细地谈了今后如何扩大、整顿队伍和打击日本等问题的想法，有目标、有谋略、有办法，使李荆璞茅塞顿开。李荆璞把于洪仁视为知己，当即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做自己的得力助手。从此，俩人朝夕相处，共谋抗日大计。于洪仁时刻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着党交给他的艰巨任务，清楚地意识到，要使这支队伍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革命队伍，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细致工作。

于洪仁既多谋善断，又机智勇敢。一次，伪保安队尾追

着他们的队伍，准备寻机挑衅。性格倔强、沾火就着的李荆璞怒不可遏，想马上教训一下这些敌人。于洪仁考虑这支队伍刚从救国军里拉出来，人员还未整顿好。这是队伍自立后的第一仗，关系到今后队伍的扩大和提高，不能轻易打，打就一定要打胜，打出士气来，打出威风来。他耐心地跟李荆璞讲道理说：“先别打，还是避开，这样硬碰硬地打会吃亏的。以后打仗的机会多着呢！”

接着，他们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先把敌人拖疲劳了。两天后，又将敌人诱到抗日军队的包围圈。傍晚，李荆璞悄悄地把大部队带出屯外隐蔽，于洪仁自己带一小部分部队化装隐蔽在屯里。深夜，保安队摸进屯，立即遭到抗日军队内外夹攻，保安队顿时溃散，没跑掉的被全部歼灭。这一仗，完全是按照于洪仁的部署打的，部队上上下下都无不钦佩年轻的于洪仁的胆识。

1933 年春，于洪仁从上级党组织那里得到一份情报，说敌人有五辆大车往沙兰镇运军衣。于洪仁和李荆璞商量决定劫击之。他们先在半路打埋伏，截住了那五辆大车，缴了押车敌人的武器。然后由一部分人化装成敌人模样，在天黑之后，大摇大摆地开进沙兰镇，缴获了伪保安队一个中队的枪。抗日军队无一伤亡，就得到五车单衣，解决了部队部分夏装问题。

宁安街里有个高利贷者关祥，是个铁杆汉奸，经常破坏抗日军队的募捐活动。于洪仁决心要除掉这个民族的败类。他带领一部分人化装为卖柴禾的农民，把武器都藏在柴禾里，赶着柴禾车进了城。进城后，他们把柴禾车赶到地下联

络站孙八爷那里。孙八爷的院子和关祥的住处只隔着一道墙。半夜时，于洪仁率领战士翻墙到关祥家院内，突然冲进屋里将关祥就地处死。之后，在城里贴了一些宣传抗日的传单，迅速撤出城外。

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理论水平，于洪仁积极向官兵宣传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李荆璞从于洪仁的言行中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道理，庄严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于洪仁的影响帮助下，先后有很多人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并在这支部队建立起了党支部，使这支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成为“宁安工农义勇队”“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基干部队。

1933年6月，日军对救国军余部、山林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和“讨伐”。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许多山林队动摇了，准备投降日军。宁安工农义勇队内部也受到一定影响。于洪仁和李荆璞为了制止投降倾向，召集宁安一带山林队首领开联席会议。于洪仁事先在党员中做了思想发动工作，让他们在会上广泛地进行反投降的宣传活动。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会议开得很成功，订立了抗日到底，决不投降的共同抗日公约，有力地批判、制止了投降倾向，坚定了广大爱国官兵抗日到底的信心，给日本侵略者的诱降阴谋和顽固分子以沉重的打击。

同年冬，由于后收编的队伍没有经过教育和整顿，有些人的恶习未改，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时常发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洪仁召开支委会专门作了研究，作出整顿部队的

决定。在整顿部队的过程中，于洪仁、李荆璞用讲故事、猜谜语、唠家常的方式，把广大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向他们宣传整顿部队的意义和内容；同时，对大队长、中队长进行了个别说服教育工作。

1934 年 1 月，部队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李荆璞当众宣布部队以后要废除剥削制度，枪支、马匹等财产归公，官兵一律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和施行肉刑。

这些措施一公布，立即得到大多数班排长和分队长的拥护和支持。但也有几个反动家伙预谋杀害李、于二人，然后叛变投敌。于洪仁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党支部紧急会议，研究了除恶的办法，逮捕了这些坏家伙，并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两个主要反动分子。对随从和罪行较轻的人，进行教育后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党支部按照党的建军原则，在部队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于洪仁经常给部队干部战士上政治课，协助李荆璞组织练兵活动，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于洪仁还经常编些歌曲，教干部战士演唱。同年 2月，于洪仁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委员和军委委员。在同盟军总政治部领导下，于洪仁在宁安工农义勇队中建立了政治研究班、识字小组、士兵代表委员会和士兵反日会等群众组织，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1934 年 8月 21 日，于洪仁带领部队在大唐头沟一带活动时遭叛徒杀害，英勇牺牲。

（郭健军）

卫 祖 胜

（1889—1934）

卫祖胜，又名李祖生，1889 年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刘家营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以教书为业。卫祖胜兄弟 4 人，他是老大，大弟祖荣，二弟祖兴，三弟祖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卫祖胜的一家同千百万贫苦农民一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卫祖胜 7 岁起，就同母亲下地劳动，而不能到父亲的学堂里去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地懂得了，在那黑暗的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哪有受教育的权利！他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平等的人而生活于世。父亲的薪水入不敷出，母亲的身体日渐衰弱，家庭生活的重担落到了卫祖胜的双肩。为了全家人的生存，他拼命地劳动。他还学会了石匠的手艺，常常在农闲时节走湾串户，帮人凿磨，增加收入，弥补家庭经济生活不足。但是，到头来仍然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辛亥革命震撼了中国大地，也给卫祖胜以希望。谁知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袁世凯窃取，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卫祖胜愤怒地对朋友们说“这样的世道,我恨不得一拳砸碎它。”

艰苦的劳动，锤炼了卫祖胜坚强的性格，也增进了他同贫苦农民的诚挚感情。他性情豪爽耿直，为人忠厚诚实，乐意为穷人办事。乡邻中谁家有了为难之事，他更是全力相助。因此，湾中出了大小事，乡亲们总要找他商量，连夫妻之间的争吵，也要找卫祖胜去排解。他常对人说：“我们穷

苦人要互相帮助。”他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充满了仇恨。有一次，当地大豪绅徐钧弼父子，依仗权势，强行霸占了刘家营的一片山林地。当时，刘家营的贫苦农民刘克家和吴明志与徐家父子讲理，竟遭到徐家父子的毒打。徐家父子还逼迫刘克家和吴明志写血书，承认山林地是徐家的地产。卫祖胜知道这一情况后，气愤万分，当即组织同村的几个青年去同徐家父子讲理，好心的老人劝他说：“忍下这口气吧，人家有权有势，我们斗不过的。”可卫祖胜硬是找到徐家说理，结果遭到徐家父子的辱骂并被赶走。这件事使卫祖胜深思：有权势的人不多，却能横行乡里，任意欺压贫苦百姓；而众多的劳苦农民，却甘心忍受，不敢反抗，任凭他们胡作非为。这到底是为什么？

1925 年秋天，中共湖北省委为了发动群众，迎接革命高潮到来，派共产党员吴光谟深入到孝感东北部进行秘密革命串联活动。有一天，吴光谟从红山寺前往卫店的途中，正好与卫祖胜同行。从交谈中，他了解到卫祖胜是一个贫苦农民，就向卫祖胜宣传革命道理。卫祖胜听后，极为高兴，当即邀请吴光谟到自己家中住下，并请他详细介绍外地的革命形势，同时向他倾吐了埋藏在心底的种种疑团。经过吴光谟的启发、教育，卫祖胜心中豁然开朗，他坚定地向吴光谟表示：“我卫祖胜盼望革命日久，今天才找到引路人，这条革命的路我走定了。”从此以后，卫祖胜积极投身到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火热斗争之中。

当时，孝感地区仍处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统治之下，卫祖胜在吴光谟的指导下，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事实，启发贫苦农民的革命觉悟，动员他们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织起来，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以求得自身的解放。不少农民在他的耐心帮助下，提高了觉悟，消除了害怕心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形成了一支以吴明发、吴明志、邹玉堂、孙义华等人为骨干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卫祖胜的带领下，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处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他们在传单上写着：“土豪劣绅逞凶狂，霸我土地抢我粮，我们成年累月做，生活如同牛马样，这种世道不改变，穷人年年总遭殃，赶快觉悟团结紧，斗倒豪绅我解放。”这样的宣传发动，使贫苦农民很快觉悟，革命的烈火逐渐燃烧起来，有的地方还开展了抗捐税和减租减息，形成了同豪绅面对面斗争的形势，为以后农民协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直系军阀吴佩孚逃往河南郑州。为了阻止北伐军突破武胜关，吴佩孚企图派兵破坏花园以北的铁路。在这紧要关头，卫祖胜一面启发、教育铁路工人，希望他们好好护路；一面领导卫家店到王家店一线的2000多名农民同敌人开展斗争，终于挫败了吴佩孚的阴谋，保护了铁路，保障了北伐军顺利抵达武胜关。这场护路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吴光谟、卫祖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1926年10月中旬，在刘家营成立了卫家店农民协会，卫祖胜被选为主要负责人。11月，卫祖胜由吴光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卫家店农民协会的建立，促进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各地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全县先后成立了区农会10个，乡农会30个，农会会员达9.4万余人。在此基础上，于1927年1月正式成立了孝感县农民协会，选举卫祖胜为县农协委员长，并以县农协名义，印发《告全

县农友书》。此后，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

卫祖胜根据党指示，除继续领导农民协会的工作外，还非常注意在农民骨干中培养发展党员，筹建党的基层组织。到 2 月，他便先后发展了吴明志、吴明发、邹玉堂等 9 人入党，成立了孝感北部地区的第一个党的支部委员会，卫祖胜担任支部书记。从此，卫家店地区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健康地发展。

党支部成立后，卫祖胜十分重视党内的思想建设，他经常组织党员学习时事政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五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开一次支委会，每个党员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尽管当时环境恶劣，党的活动处于地下，但在卫祖胜和党支部的严密组织下，党内生活从未间断过。后来，这批老党员始终保持了革命的坚定性，如共产党吴明志、孙义华、卫祖荣等被捕以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对党无比忠贞的革命情操，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3月，卫祖胜、徐目峰等人受县农协委派，赴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农讲所，他们聆听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教诲，对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前途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斗争的方向更明确了。

6月 26 日，孝感县白沙地区的豪绅头子潘九斋、徐滙川等人，勾结一批“红枪会”匪徒，举行反革命暴乱，围攻白沙铺，残杀农会干部，抢劫会员家财，还妄图迫害县农协

特派员。7月1日，他们围攻孝感县城，在国民党反动县长邓元朗的纵容下，将县党部、县农协的办公地点捣毁，还缴了农民自卫队的武器。事发后，汤经畬、卫祖胜等人联名向县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将事件经过写成报告，由卫祖胜、邹玉堂两人亲送省党部和省农协，呼吁省政府严惩凶犯。在汤经畬、卫祖胜等人的坚决斗争和农协的干预下，事件得到及时处理。

同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施行了残酷的镇压。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卫祖胜丝毫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仰。为了积蓄革命力量，他将幸存的共产党员进行疏散隐蔽，自己也以石匠为业，转移到汉阳侏儒山进行地下活动。到8月中旬，他又潜回孝感的芳畈（今属大悟县）地区开展秘密的革命串联工作。他秘密发展了贫苦农民戴远章、汪正应、黄大志等入党，同他们一起支持斗争，积极筹备成立芳畈区农民协会。

8月1日，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消息传来，给卫祖胜以深刻启发，他想到：到处躲藏，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武装还击。于是，他毅然回到家乡刘家营，着手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共产党员王自强和颜光弟也来到了卫家店地区同卫祖胜取得了联系，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此后，他们就一同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9月初在卫家店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赤卫队，共30多人，这是孝感县第一支革命武装。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建立京汉路南段党的特别工作委员会，派郭述申主持特委的工作，卫祖胜、黄

明清、颜光弟为特委成员。在黄麻起义的日子里，卫祖胜在特委领导下，组织小河、花园、卫店一带农民开展破坏铁路、阻敌进山的斗争。他们将花园至王店的铁轨全部拆除，捣毁了这段电话线路。卫祖胜还率领赤卫队袭击了卫家店车站。

1928年春，汪精卫反动政府派改组委员到各地改组县党部。孝感县内的地主豪绅趁机用封建迷信的手段，欺骗农民参加“红学会”，拼凑民团，企图扩充反动队伍，达到分裂革命群众，破坏革命运动的目的。卫祖胜鉴于这一情况，决定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农历正月十五日晚，他带领赤卫队镇压了李家大庙的反动豪绅李少臣，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开仓分粮给贫苦农民。17日晚，卫祖胜又带领赤卫队袭击了反动头子、小河分县衙门首领徐钧弼的住所，枪决了其父徐德崇和帮凶徐德如，愤怒的群众还放火烧毁了徐家的房屋。这些行动沉重打击了反动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广大农民无不兴高采烈，拍手叫好，有的农民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赤卫队，要他们跟着卫祖胜干革命。

与此同时，卫祖胜还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红学会”内部，进行秘密宣传活动，揭露地主豪绅的欺骗伎俩，使不少人提高了认识。“红学会”中有的人洗手不干了，有的人参加了赤卫队，还有的留在“红学会”里为赤卫队搜集情况，“红学会”事实上趋于瓦解。

1928年底，孝感特支负责人刘纪堂等人从县城来到刘家营，同卫祖胜一起领导孝感东北部的革命斗争。1929年2月，省委决定成立孝感中心县委，派徐宝珊任县委书记，卫

祖胜、刘纪堂参加县委，卫祖胜仍负责武装工作。

1929年秋，鄂豫边区特委召开各县县委联席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后，边区特委派了30多人充实到卫祖胜的赤卫队里当战斗骨干。卫祖胜带领着这支队伍，活动在卫家店、小河溪、芳家畈、汪洋店一带，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生产运动。秋后，又将活动的范围扩大到黄陂的夏店，为创建孝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卫祖胜领导的武装斗争，使这一带的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卫祖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总想尽早除掉。1929年9月的一天夜晚，土匪头子徐钧弼和反动豪绅李光鼎窥测到卫祖胜带着几名赤卫队员到了卫家店，便倾巢而出，包围了卫家店，妄图一网打尽。面对众多的敌人，卫祖胜镇定自若，沉着应战，毫不考虑个人安危。为了减少群众的伤亡，他带着赤卫队员冲出湾村，利用树木作掩护，且战且退，伺机突围。由于赤卫队善于夜战，而“清乡团”是一群乌合之众，赤卫队员一阵猛冲，突出了重围。徐、李二匪，凶相毕露，抓不到赤卫队，就残杀赤卫队的亲属，逼迫卫祖胜的母亲上吊身亡，放火烧毁房屋30多间，使刘家营的群众又一次遭到蹂躏。之后，他们到处张贴通缉令，声称“捉到卫祖胜，一两骨头，一寸金。”

1930年3月初，国民党指令钱大钧的教导师进驻孝感，并以一个整团的兵力“围剿”卫祖胜的赤卫队。卫祖胜采取“避实就虚、零打碎敲”的战法，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有一次，敌军约一个排的兵力到王家岗抢夺粮食，被卫祖胜获悉。他带领赤卫队从沙窝直奔王家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围歼了该敌，缴获长短枪 30 余支。

这时，徐向前率红一师来孝感发展革命根据地，将赤卫队改编为红色补充军第七师，卫祖胜任师长，司令部设在小河溪。补充军成立后，第一次武装行动是配合红一师攻打花园镇。7 月 29 日拂晓，徐向前指挥红一师攻打花园镇，卫祖胜在外围阻击增援的敌军。仅 3 小时激战，钱大钧的第五团全团覆没，无一漏网。战斗结束后，徐向前拿出一部分枪支给卫祖胜，补充第七师的装备。

1931 年 1 月，卫祖胜任鄂中区特委常委兼孝感县委书记。

3 月，蒋介石指令岳维峻为前线总指挥，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在反“围剿”战斗中，戴季英、卫祖胜带领鄂中地区的革命武装在花园一带阻击增援之敌，还发动铁路沿线的群众拆毁花园以北的铁路数十里。根据地军民的协同作战，击败了敌三十四师的进攻，敌师长岳维峻在双桥镇被红军活捉，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5 月 13 日，中央分局正式成立后，决定撤销鄂中区特委，成立陂孝北县委，戴季英任县委书记，卫祖胜任县苏维埃主席。

7 月，中央分局召开鄂豫皖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卫祖胜出席了会议，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代表大会上，中央分局领导沈泽民向全体代表介绍了卫祖胜的事迹，说他忠诚、朴实、勇敢，在群众中有威信，是卫家店地区的农民领袖，是个好党员，为创建陂孝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会上，大家一致选举他为鄂豫皖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